

“语文”何以成为学科名称

——基于词语内涵演变的教育史考察

唐千千，施克灿

摘要：“语文”成为学科名之前，在近代中国曾经历过长时间的词义演变。它作为词语最早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的《申报》中，洋务运动时期，迫于学习别国语言文字的需求，清政府外交文件中大量出现“语文”一词。1904年，“外国语文”作为“补助课”正式出现在癸卯学制中。192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推行语体文，围绕“国语”使用了“国语文”“国语文学”“国语语法”等词语，丰富了“语文”的内涵。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众语文运动”开展，“语文”成为反映大众意识的语言文字；为扫除文盲、推行识字教育，民众教育馆、陕甘宁边区教育中出现“语文教育”。1950年，“语文”取代“国语”“国文”，成为新中国用来指称语文学科的名称。这种名称变化固然受到政治、文化、社会等外部因素影响，但更是“语文”一词逐步形成的内在含义适应了当时学科发展需求的结果。

关键词：语文；词语内涵；学科名称；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660(2026)02-0039-12

“语文”如何产生？最终又如何成为我国母语学科名称？要解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对“语文”进行概念界定。关于“语文”的释义，已有不少学者作出解释。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王富仁认为“语文”概念有“大语文”和“小语文”之分，所有用文字表述的东西都可称为“大语文”，而“小语文”则更多是当今具有学科性质的语文。^①与之类似，谢保国区分了广义的“语文”和狭义的“语文”，认为前者包括口头语言、书写的文字以及作为学校课程的语文，而后者仅指作为课程的语文。^②陶本一和于龙从天赋、素养和学科三个方面阐述了语文的内涵，认为作为“天赋”的语文，是指人天生潜在的一种语言本能；作为“素养”的语文，是指人的综合语言素质，由先天的语言天赋和后天的语言实践组合而成；作为“学科”的语文，是指通

作者简介：唐千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施克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① 王富仁：《情感培养：语文教育的核心——兼谈“大语文”与“小语文”的区别》，《语文建设》2002年第5期。

② 谢保国著：《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稿》，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0—711页。

过系统的学科学习来提高语文素养。^①解光穆则受他们启发,将“语文”的词义与所指对象分成了五个方面:汉字、汉语、汉文等,作为客观存在的“语文”;天赋、模仿与习得等,作为生存条件的“语文”;运用与掌握等,作为实践活动的“语文”;传递、学习与使用等,作为学校教育的“语文”;学得、使用与提高等,作为课程实施的“语文”。^②这些学者均是对当今的“语文”进行概念阐述,从中可见“语文”的内涵确有复杂性。但其实该词语产生之初,含义比较单一。本文所考察的“语文”也很难用当下学者的某一种定义去解释,因为历史考察的过程是动态的:“语文”在最初诞生到1950年成为学科名称的历史过程中,其含义是不断丰富、发展的,其学科概念也是逐步形成的。

目前学界关于“语文”为何能够成为学科概念的研究不够丰富,许多语文工作者都认同叶圣陶的解释:“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③已有成果集中于梳理这门学科名称的更替过程,并分析更名的原因,如尹逊才从学科名称的变化考察分析语文课程内容的嬗变^④;张心科认为“语文”最终被固定为学科名称,是因其揭示了学科的本质属性^⑤;张毅从文化、政治和课程的角度探讨1950年“语文”学科形成的原因^⑥;郭戈从课标、教科书等角度肯定了语文更名的意义^⑦。本文讨论的核心并非语文学科的更名史,而是语文词语的发展史,关注发展过程中词语如何与学科进行互动并最终促成“语文”成为学科名称。研究发现,除了外部力量推动,更重要的是“语文”的词义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其内在逻辑,逐渐大众化并具备学科属性,适应了新中国母语学科发展的需要,最终才完成了从词语到学科的转变。据此,本文结合“语文”自身的发展特征与时代背景,从教育史的视角考察“语文”从词语逐步成为学科概念的过程。

一、“语文”一词的产生

中国古代没有“语文”这个词语,只有“语”和“文”分别成词表意。清中晚期,一批研究小学和经学的学者提倡“声转说”,注意到“语言”对于研究“文字”的作用,在研究时注重从声韵、语音入手考察文字,这使得语言和文字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洋务运动时期,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需求增加,“语言文字”逐渐被简化为“语文”,但此时仅是“语言”和“文字”含义的简单叠加。

(一)“语”和“文”的古代溯源

中国古代并非没有“语文”,只是那时的“语”和“文”均是单独表意,尽管有合用的情况,但是这两个字并未联合表意,因此古代的“语文”并不能算是一个词语。如江淹有“古者

① 陶本一、于龙:《“语文”的阐释》,《课程·教材·教法》2007年第11期。

② 解光穆:《“语文”释义与课程论认识意义——语文课程内容建设论略之七》,《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③ 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三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页。

④ 尹逊才:《从“词章”到“语文”——由名称演变看语文课程内容的递嬗》,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⑤ 张心科:《语文科百年正名史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⑥ 张毅:《六十年“语文”史论(1887—1950)》,《教育学报》2013年第6期。

⑦ 郭戈:《“国语”“国文”改为“语文”的由来及启示》,《课程·教材·教法》2025年第2期。

语质而难解，今者语文而易了”^①的表述，意为古时的语言质朴而难以明白，现今的语言有修饰而容易理解。此处可断句为“古者语，质而难解；今者语，文而易了”，“语”和“文”在这一语境中各是一个词，合起来却不是一个词。但是类似“言语文字”这样的表达古已有之，宋代的文献中记载：“京东路察访司请自今应推行差役新法，有辄传造言语文字扇摇百姓，并依扇摇保甲法，从之。”^②大意是用“言语文字”鼓动百姓，宣传保甲法。明代文献中记载：“时四夷馆无暹罗译字官，阁臣徐溥等请移牒广东，访取能通彼国言语文字者，赴京备用，从之。”^③这里的“言语文字”与晚清时“语文”的含义基本一致，指的是别国的语言文字。

尽管在古代中国，“语文”并没有成为一个词语，但是“语”指“语言”，“文”指“文字”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清代，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语言”和“文字”本身的关联，并把这种联系用于研究中。如乾嘉学派秉持“以音韵通训诂”^④的观念，认为研究字义可以从语音入手，其代表人物戴震认为小学的研究应该“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⑤。尽管他们的研究方法均是为经学教育服务，但是这种通过语言研究文字的方法与从前是很不同的，也能从传统教育的视角说明清中晚期语言与文字之间所产生的关联。到了近代，章太炎又进一步指出，字音、字形、训诂三者合起来，“乃成语言文字之学”^⑥。这是他处于近代背景下对于传统小学的重新定义，他认为“语言”与“文字”是不可分离的关系。清中晚期小学及经学研究所盛行的以语言通文字的方法，使“语”和“文”之间的关系前所未有的紧密，这样才有先简化为“语文”这一表述，后逐渐成为一个概念的可能性。

（二）近代“语文”开始合为一词

由于古代中国的语言和文字长期分离，“文”属于文字系统，“语”又属于语言系统，语言和文字系统互不相干^⑦，因此把“语言文字”合用表意的需求并不高，也没能诞生出“语文”的表达。“语”和“文”二字真正连用表意是从近代开始。

早在1815年，传教士马礼逊就曾写过一本教外国人学汉语的书，书名为《汉语言文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同样是马礼逊出版于1823年的一本中英对照的书，名为《英国文语凡例传》（*A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for the Use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是一本向中国人介绍英语语法的书。可见当时关于语法书籍的翻译中已出现“言文”“文语”，由于传教士对西方语法的传播和对汉语语法的解译，使得那时的人们或对“文”和“语”已有初步的认识与辨析。

1877年6月22日的《申报》中出现了“语文”，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早对该词语的运用：“古人出使于车书相同之地，而使才尚且难求，今人出使于语文各异之邦，而使才如此易

①〔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三册《全梁文》卷三十九，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173页。

②〔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第十册卷二百四十五，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970页。

③〔清〕龙文彬纂：《明会要》卷七十八，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514页。

④王远新著：《古代语言学简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⑤〔清〕戴震著：《戴震文集》卷第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6页。

⑥章太炎：《论语言文字之学》，《国粹学报》1906年第12号第24期。

⑦唐千千、杜成宪：《从“国文”到“国语”：一字之差背后的学科变革》，《现代教育论丛》2023年第1期。

得……”^①这里的“语文”指的是“语言文字”，且作者之后还针对“语文”进行了解释，他举例说古代人出使的国家“虽语言各异，而文字相同，不能宣之于口，尚能笔之于书”^②，很明显地区分开了“语言”和“文字”。另有《申报》上的一则消息“西士曰，仆生长欧洲，语文风土与中国迥殊”^③，此处的“语文”也是“语言文字”的意思。

洋务运动时期出于向外国学习的需要，“各国言语文字”难免被反复提及，久而久之便缩略成“各国语文”。洋务运动时期的奏疏中有时会使用“语文”来表达某国语言文字的意思，如张之洞在光绪十五年的奏议中说：“现由闽厂酌调已通英国语文及各项算学之上等学生五六十名……”^④然而这一时期上呈清政府的其他奏议公牍，以及开办的各类学堂规制章程中，涉及相关内容仍以某国“语言文字”“言语文字”的表达为主，涉及具体国家语言文字时，通常叙述为“英文”“西文”“华文”“汉文”等，说明当时“语文”作为词语的使用频率并不高。

由上述可知，19世纪中后期，由于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需求增多，“语”和“文”由古时的单字表意，逐渐结合为“语文”，变成了意为“语言文字”的词语，但其语义不固定，也并不常用，“言文”“文”“语”“言语文字”等都可以作为它的替代表达。

二、“语文”词义的固定与发展

20世纪初癸卯学制中出现了名为“外国语文”的“补助课”，这时“语文”已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语词。^⑤同时，在学习别国语言文字的过程中，一批人意识到国外的语言和文字是统一的，反观国内，因为语言文字不统一造成了教育的普及困难，所以他们的关注重心逐渐由外国语文的学习转移到本国语文的学习，由此“语文”又与语言文字的统一问题产生了联系。

（一）开设外国语言文字课程

1902年清政府将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并在预备科和速成科中设置“英、法、俄、德、日本五国语言文字之专科”^⑥。这一外国语言文字专科的具体课程名称叫“外国文”，由外国人担任教习，在预备科中的这门课程具体学习讲读文法、翻译和作文，而在速成科仕学馆中的这门课程则依次学习音义、翻译和文法。除此之外，京师大学堂的分科门目中，文学科的科目下还专门设有“外国语言文字学”。与之类似，1902年颁布的《钦定中学堂章程》中也有“外国文”，具体需要学习外国文的读法、习字、讲解、文法和翻译。由上可知，中国近代制定的第一个学制中，已将外国语言文字的学习纳入了系统的课程中，这时的“外国文”代表“外国语言文字”，其学习内容既有关于“文”的写译训练，又有关于“语”的听说训练。

1904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一些分科大学的“补助课”设有“外国语文”，并

①② 蒋芷湘等：《书论识洋务后》，《申报》1877年6月22日。

③ 蒋芷湘等：《论著书》，《申报》1877年6月27日。

④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一册《奏议》十八，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34页。

⑤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编：《现代汉语》，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90—191页。其中对于“词”的定义为“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

⑥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5页。

规定在英、法、俄、德、日中选一国语文进行修习，尽管并不是主要科目，但是“语文”这个名称第一次被写进官方学制，并开始与课程有了关联。文科大学中，又设有英、法、德等国的文学门，其主课为“英语英文”“法语法文”“德语德文”等，这可作为“外国语文”的注解，说明这“外国语文”便是教“外语外文”的课。此时的课程设置或许已经意识到了“语”和“文”的关联和区别。再看中学堂的课程安排，此前壬寅学制中有的“外国文”课程，在癸卯学制中依然存在，但已更名为“外国语”，其教法专门指出“为中学堂必需而最重之功课……方今世界舟车交通，履欧美若户庭，假令不能读其书，不能与之对话，即不能知其情状；故外国中学堂语学钟点，较为最多”，还表明学习外国语应当“先审发音”“兼使会话、习字、作文”。^①显然，与两年前的“外国文”课程相比较，癸卯学制的教法中对于这门课的要求更关注能否进行外语会话交流，也就是更重视“语”的教学了。从壬寅学制规定的大学堂和中学堂章程中的“外国语言文字学”和“外国文”课，到癸卯学制中出现“外国语文”课以及“外国语”课，体现出制定章程者对于“文”和“语”进行了区分，也意识到“语”的重要性。尽管“语文”这一名称终于在20世纪初出现在官方课程中，但此时的“语文”还与“外国”联系在一起，在官方学制章程中也只有“某国语言文字”这样的含义。

中华民国成立后，壬子癸丑学制中的课目名称却又没有了“外国语文”。在1913年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中，文科的哲学门和文学门科目中出现了“言语学概论”。文学门下有“言语学类”，其中包括“国语学”“西洋近世语概论”“东洋近世语概论”“希腊语学”等，与“国文学类”“英文学类”“德文学类”等并列，此外预科中都还设有“外国语”。^②再看1917年北京大学的本科课程：哲学门、文学门、史学门中的通科均设有“外国语”，前两者的通科中仍有“言语学”；大学文科的预科课程中有“国文”和“外国语”，政治学门、法学门、经济学门中的课程均设有“第二种外国语”。^③由此可见，民国初年的大学课程中均开设专门研究语言的“言语学”“言语学概论”，大学预科课中还承续了此前“外国语”的名称，足见当时政府更加重视外国语言教育。尽管此前清末学制“补助课”中的“外国语文”这一名称未被采用，但也许恰恰说明西方语言学的相关论著此时正大量被国内接纳并消化，所以大学中才会专门开设“言语学”相关科目，“语”和“文”的区别也因而更加明确，不需要再用“语文”这样一个泛指“语言文字”的词来作课程名称了。

（二）统一语言文字的简化表达

19世纪中后期就已有人意识到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不统一，而这种不统一阻碍了知识的普及与教育的发展，于是他们提出要言文一致，让更多的人能够识字写字。这种观点到20世纪初获得更多人的声援，如1905年《学报汇编》上刊登了一则关于“语文学”的消息：“近世论者谓政治统一，必先由语言文字全国统一，为入门之肇基。然此事欲实行殊非易易。即如英国文字今已通行于天下，而所奇者，在英国本国之威鲁司及苏格兰、爱尔兰等处，尚多有不能通英文者。”^④尽管消息中并未明确指出“语文学”的含义，但是可以推知此处的“语文”也可

①②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321、698—699页。

③ 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91—396页。

④ 《文字统一之难》，《学报汇编》1905年第25期。

作“语言文字”解,更重要的是,对国外语言文字的学习与考察,使一部分国人更清晰地意识到国内的语言和文字也是不统一的,所以此时的“语文”一词所包含的意蕴,已不仅是19世纪末清政府政令中所说的学习别国语言文字这么简单,还与“语言文字统一”产生了关联。1913年的《神州日报》上有一则名为《语文统一会成立》的消息,明确地表明了“语文”与统一语言文字之间的关系:“言文一致欧美皆同,惟中国语言各地不同,而文字更为繁奥,故记识甚难,因此全国识字之人不及百分之二三,诚为普通知识一大障碍。”^①这里“语文统一会”中的“语”和“文”,各自代表了“语言”和“文字”,且与此前作为“外国语言文字”简化而来的“语文”不同,这里的“语”是中国各地的语言,“文”是中国的文字。同年的《盛京时报》上也有关于统一语言文字的记载:“国家自强之本,莫要于讲求国民普通教育,而教育之普及,尤以统一语言文字为第一要义……大凡交通便利,则接触多,彼此自共留意于通用之语文,而不复墨守旧习矣。”^②此处的“语文”,虽然也指的是“语言文字”,但已承担了普及教育、救国强国的任务。

另一个与“语文”相关的事件是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20世纪初的报纸杂志上大量出现“世界语文学”,但是这里的“语文”并没有作为一个词表意,而是意为用“世界语”创作的“文学”,如1924年刊登在《学生杂志》上的一段话:“文学是语言的生命。无论何种语言,都须有文学,才能维持永久的生命,才能普遍于一般民众。国语如是,国际语亦如是。”^③这可以说明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强调“文学”的重要性,任何语言都需要有文学才能够在大众中普及,并保有语言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就是在此之前已出现了用“世界语”创作的文学,这段话可以说是“世界语文学”的注解。显然,“世界语文学”仍与语言文字的一致有相当大的关系,因为“世界语”本身就是一种人造语言,创造它的目的是想要让全世界的人都能使用一种通用语言,这与当时中国提倡的“语文一致”相符合。因此,当首创于1887年的世界语,约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后,就被不少学者提倡。自1914年开始,“世界语文学”逐渐成为当时报纸杂志上的高频词汇。这一时段开始出现的“语文一致”观念,以及传入中国的“世界语”,看似与后来“语文”的含义无关,实际上已经渐渐拓展了“语文”内涵。相较于19世纪末的“语文”和20世纪初癸卯学制中的“外国语文”课程,此时的“语文”中,“语”和“文”的区分的确已经更加明晰。此外,“世界语文学”的使用,也让“文”除了代表文字,还多了一层“文学”的含义,后来出现的“国语文学”“语文系”等概念中,“文”也都有了“文学”的意思了。

20世纪初,“外国语文”作为“补助课”出现于官方学制中,其目的就是学习外国的语言文字,培养能与其他国家沟通交流的人才,这体现出“语文”的工具性特征。此外,尽管这门课所授内容与现在的语文课有区别,但从学科的角度看,“语文”已经是学校某门学科名称的一部分了。此后,由于“语”和“文”的分工更明确,一些大学在课程设置上已经不再用“外国语文”。但由于当时的中国要求“言文一致”的大趋势,以及“文学”的加入,使“语”和

①《语文统一会成立》,《神州日报》1913年3月1日。

②《论中国宜亟统一语言文字》,《盛京时报》1913年3月1日。

③《世界语文学(一)》,《学生杂志》第11卷第11期,1924年。

“文”这两个字又重新结合，并衍生出新的内涵。

三、“语文”词义的多样化

受此前社会上统一语言文字、推广白话文的观念与实践影响，192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通告国民学校的“国文科”改名为“国语科”，并在全国推广语体文教学。自此，“国语”也就成为官方语文学科的名称，以“国语”命名的教材、图书等大量出现。“国语”在官方学制中的出现，也可以作为“语文”一词在近现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因为“国语”的流行，“国语文”“国语文学”“国语语法”等名称逐渐出现，反映出“语”有国语、普通话的意思，“文”有文言文、文学的意思，使得这一阶段的“语文”词义多样化。

（一）以“国语文”命名的教材与文章

伴随“国语”流行，这一时段的教材命名几乎都与之有关，一些教材中使用了“国语文”作为名称的一部分，“语文”也因“国语”的盛行与发展而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

1920年朱毓魁编选了《国语文类选》，这应该是“国语文”第一次出现在教材名称里。此后又陆续出现一些以“国语文”命名的教材，这些教材也都对“国语文”进行了解释。如《中学国语文读本》提出：“国语文的推行，稍有知识的，都已觉得急不容缓。现在不但小学中感必要，就是中学学生，像在初级中学的，也感得非用国语不可。”^①可见此处的“国语文”是要在中小学中推行用“国语”写文章。与此用法类似的是在1922年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校，国文科第一学年学习的内容有“讲读（国语文、古文）、文法、作文（重语体）”，第二学年学习的内容又包括了“讲读（国语文、古文）、文法、作文（重文言）”。^②“讲读”课中包含“国语文”与“古文”，可推知这里的国语文区别于古文，是讲读用“国语”写的文章。

除了上述列举的教材课程对“国语文”的解读外，一些名称中包含“国语文”的教材，似乎对“语”和“文”的内涵也有不同理解。例如《新法国语文教科书》中对于“文”的理解就与前面不同：“本书编制的方法，除诗歌外，大部分是语文对照的；后两册并且有几课浅近的文言文，不用语体文对照。所以叫作国语文教科书。”^③这里的“国语”是指语体文，“文”指文言文。类似的还有1927年编纂的《新小学教科书国语文学读本》，这本教材编写的目的是“养成能作语体文之技术，兼有能读文言文之能力”，为了引起儿童读文言文的兴趣，“于通用语体叙述中，应当时情事，插一段文言文”。^④据此推测这里的“文”亦有“文言文”的含义。

此外，还有一些人对于“国语文”的内涵给出了自己的解释：1923年李志毅对“国语文”进行定义，他认为“‘国语文’这三个字就是黎先生所说的‘纸上的国语’，因为别乎‘国语话’而产生的，把文字依照全国标准语的文法语调词类，写出来使人一看就明白，这一种文字就是国语文了”^⑤。他的解释更加明确：“国语话”是用“国语”说出口的内容，“国语文”则

① 秦同培选编：《中学国语文读本》，世界书局1923年版，第3页。

② 舒新城：《中学学制改革问题》，《教育杂志》第14卷第1期，1922年。

③ 方宝观、庄适、顾颉刚等编：《新法国语文教科书》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2页。

④ 李步青编：《新小学教科书国语文学读本》高级第一册，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1页。

⑤ 李志毅：《谈谈国语文》，《新无锡》1923年11月16日。

是用“国语”写成文字的内容。与前文所述以“国语文”命名的教材既包括口头的讲读,又有笔下的作文不同,李志毅的定义明确了“文”是指纸上的内容,并不包括口语的内容。这一观点与叶圣陶选用“语文”作为学科名称的理由颇为相似,也说明早在1923年就有人从词语的使用上,明确了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区别。1926年朱翊新也针对当时的小学语文教育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在《纵看与横看——小学教学语文问题》一文中表示,小学教学就应该用语体文,因为这是横向地向大众普及语言文字,至于读书人可以纵向研究文学、文字等,并不妨碍向大众普及语文。^①该文中所提到的“语文问题”指的是大众的“语文”,而不是读书人研究的文学。

(二)“国语文学”的盛行与“语文系”的开设

关于“国语文学”的定义向来众说纷纭。周作人曾给出过一个解释:“国语文学就是华语所写的一切文章。”^②从这个解释中,至少可以明确这里的“文”有“文章”“文学”的意思,而这里的“语”是用来写“文”的,并不是一开始“语言”和“文字”的并列关系,这与前面提到的“世界语文学”用法类似。同时,“国语文学”也作为授课内容,出现在当时的一些大学暑期教学安排中。譬如,1922年南开大学暑期学校里就开设了“国语文学小史”“国语文法概论”课程。^③次年,保定暑期讲习会的国语科,也开设了“国语文学”和“国语文法”的课程。^④值得注意的是,受西方文法语法的影响,这一时段中国人更深入地意识到本国语言文字也有其自身的结构和规律,也需要进行系统分析以更好地使用,因此“文法”“语法”也成为“文”和“语”的多种释义之一。

这一时段的“语文”中,“文”作为“文学”的含义出现,不仅存在于“国语文学”中。20世纪20年代后期,“语文系”这个名称开始在一些大学中被使用。1926年的东南大学,已经设有“外国语文系”。^⑤1929年的《私立光华大学教务年报》反映了光华大学各个系的课程设置情况,其中包含了“中国语文系”和“外国语文系”。“中国语文系”的共同必修课程有基本国文和文字学,专业必修包括诗词学、文学概论、文学批评等。^⑥该系的具体课程设置,以现在的标准看其实偏文学研究,而缺乏专门针对中国语言、语法的研究课程。1930年《暨南校刊》中可见,暨南大学文学院下设“中国语文系”。^⑦“语文”在当时不同的大学院系名称中被使用,至少能够说明这个词发展到这一阶段,已经完全固定下来,并且这与前文所论的“国语文”等词不同,“语文系”中的“语文”,主要指“语言文学”,围绕这个“语文”所展开的实践,也更偏重于文学研究。

上述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以“国语文”命名的教材、与“国语文”相关的课程,都体现出“语”与此前不同的含义。之前“语文”中的“语”大都是泛指语言,但是自新文化运动

① 朱翊新:《纵看与横看——小学教学语文问题》,《无锡新闻》1926年1月1日。

② 周作人著:《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京出版社2020年版,第149页。

③ 《南开暑期校课程》,《大公报》(天津)1922年5月6日。

④ 《保定之暑期讲习会》,《晨报》1923年7月22日。

⑤ 《东大本学期各科系之教授》,《时事新报》(上海)1926年8月14日。

⑥ 《私立光华大学教务年报》,私立光华大学1929年编印,第30—33页。

⑦ 《暨南校刊》1930年第79期,第34页。

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推行用语体文进行教学之后，“语”又多了国语、语体文的含义，同时，“文”的含义也不再单是“文字”，而是根据语境不同衍生出“文言文”“文学”“文法”等含义。这也丰富了“语文”的语义：它是教材与课程名称的构成部分，也是部分大学里院系的名称。此外，相较上一阶段“语文”只是作为学习语言文字的工具，这里的“语文”与文学、文化等产生关联，具有一定的人文性。

四、“语文”应用的大众化与学科化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伴随大众语文运动的兴起，“语文”这个词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大众视野。民众教育馆、民众学校中出现“语文教育”，该教育的目的是“扫除文盲、对成年失学民众补习文化知识”^①。陕甘宁边区的中小学教育中同样设置“语文教育”。此外，该时段出版的包含“语文”二字的研究型刊物和图书越来越多，这些研究的受众面也不仅是学者，还有大众。这一阶段“语文”已具有如课程、教学内容、学科目标等学科应有的基本要素，且无论是从研究的角度考察，还是从实用的角度分析，“语文”都有较为明显的大众化特征。

（一）语文教育的大众化

论及20世纪30年代“语文”一词的运用，就不得不提及大众语文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学界针对文言、白话和大众语展开论战，积极推行大众能说的语言和大众能写的文字。不少学者都发表了自己对于大众语文的看法，并给出了如何让语文更加大众化的意见。胡愈之在《关于大众语文》一文中特别强调了“语文”的大众性，认为当时的首要任务并不是反对文言文，而是积极地建设并应用“代表大众意识的语文”。^②陶行知曾表示“大众语与大众文必须合一”，并对“大众语文”作出解释：“大众语文是大众高兴说，高兴听，高兴写，高兴看的语言文字。”^③鲁迅对于“大众语文”提出了更深刻的反思：“和提创文言文的开倒车相反，是目前的大众语文的提倡，但也还没有碰到根本的问题：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④鲁迅赞同汉字拉丁化的提议，目的也是推行一种大众能写的文字。众学者的论争能够说明在这场运动中，“语文”这个词与大众紧密相连，“语”是大众都能说的语言，“文”是大众都能写的文字，“语文”则是需要反映大众意识的语言文字。

同一时段，“语文教育”也开始在民众教育馆中出现。1931年刊发的《民众教育通讯》上，记载了当时镇江民众教育馆开办的各类教育，“语文教育”便是其中一部分。“语文教育”中的“民众学校”里开设了“国语”课程，这门课程的目标是“认识并运用日常生活必需的文字”“培养公民教育及生计教育的基础”。^⑤这里的“语文教育”主要是为提高民众的识字率，推行国语以及更便写的文字符号。1933年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中也有“语文教育”，其中成人班同样开设“国语”课程，同时青年读书会中的“指导学科”中又出现了“语文学”，该科又被分为“本国语文”“外国语文”“语文学”“应用文”等具体内容。此外，刊物中还阐明

① 周慧梅著：《近代民众教育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7页。

② 胡愈之：《关于大众语文》，《申报》1934年6月23日。

③ 陶行知：《大众语文运动之路》，《申报》1934年7月4日。

④ 公汗：《中国语文的新生》，《新生》第1卷第36期，1934年。

⑤ 《下篇 事业 第一章 语文教育 一、民众学校》，《民众教育通讯》第1卷第4、5期合刊，1931年。

了将语文教育放在其他教育前面的原因：“种种教育，总不能舍语文教育而图畸形之发展也。故本馆厘定的目标，以语文教育冠其首。”^①这就揭示了语文学科的特性，强调其基础性地位。1941年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中，对当时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的课程进行了规定，其中就包含“语文教育”，下设“国语课程”。^②在边区小学开展的语文教育，主要目的是扫除文盲，教民众识字、学会用文字进行基本的日常交流。例如延安甘泉张槐湾小学的一名教员就通过《一念下书 老百姓就送子女上学了》一文，叙述了当时的教学境况：一开始家长不愿意送子女去学校，是因为“念了好几年书，老识不下字”，于是他注意“抓紧学生的学习”，并向家长报告成绩以及学生的识字情况，之后家长便乐意送孩子去念书。^③可见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的语文教育，是“为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教育”^④，目的是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识字念书。

此外，还有一批人对于语文学科应该用什么名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王向辰在一篇名为《语文教学》的文章中，表示当时的“国语”和“国文”都不足以概括语文学科的特征，只有“语文”既包括“说话”又包括“作文”，作为该学科名最合适。他还论述了语文教学的重要性和范围：重要性在于它是一套儿童需要学习的“文字工具”；语文的范围也不应局限于课本，生活中的一切语言文字都可以成为语文教学内容。^⑤1947年沈百英与朋友讨论国语的教学问题时，也提到了“国语”作为学科名称的片面性，应改为“语文”，以体现口头“语”和书面“文”的结合。^⑥这些讨论说明早在叶圣陶之前，社会上就已经出现了要以“语文”命名学科的观点。

以学科概念的标准看，这一阶段的“语文”在实际应用上注重教授民众基本的语言文字，并开设相关课程、设定教学目标，基本具备一门基础学科应有的特征。

（二）语文研究的通俗化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不仅是作为民众学习基础工具的“语文”得到发展，关于“语文”的研究也大量增加。

《图书汇报》上曾刊登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书刊目录，从它的分类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于“语文”认知的变化。1911年的《图书汇报》中，与“语文”相关的图书分类是“经类”“文学类”和“子类”。^⑦一直到1923年，这种分类大体都没有变化。直到1931年出现了“语文学”和“文学”类并列，并且不再有“经类”。1931年新出现的“语文学”类下设“语文学原理”“国语学”和其他国家的“语文学”等小类，主要是关于各国语言文字的语法、文法、发音、会话等知识的图书分类，而此前的“文学”类则是关于各国文学作品、文艺思潮、

^①《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 半年来工作概况 第二期》，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编辑委员会1933年编印，第15页。

^②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辑：《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页。

^③《一念下书 老百姓就送子女上学了》，《边区教育通讯》第1卷第6期，1946年。

^④施克灿、刘文佳：《百年党史 百年教育》，《基础教育论坛》2021年第17期。

^⑤王向辰：《语文教学》，《国语周刊》总第226期，1935年。

^⑥沈百英：《国语科的初步教学法》，《教育杂志》第32卷第3期，1947年。

^⑦《商务印书馆图书汇报》，总第66期，1911年。

文学评论、文学史等的书籍分类。^①新分类“语文学”中的图书，主要是针对语言文字的用法考察，这是关于语言文字本身的研究，而这类关于文法、语法的图书之前并没有专门分类，只是分散在“文学”下的“文法”“字书”“国音国语”等小类下面。可见，1931年《图书汇报》中“语文学”类的出现，表明了当时人们对语言文字的研究和文学的研究有了更清楚的区分，语言文字和文学应当是并列而非包含的关系；同时，相较20世纪前二十年而言，这时也出现了更多专门研究语言文字的书籍，因此在1931年商务印书馆的图书目录中，以“语文学”命名的分类与“文学”才会并列出现。

正如前文所论，这一时段出现许多以“语文”命名，对“语文”进行讨论、研究的刊物和书籍，如《中国语文学丛刊》《中国文法语文通解》《语文零拾》等。尽管这些研究专业性很强，但是许多语文研究者在编辑、撰写相关文章书籍时，十分注意研究的实用性以及大众的可读性。如1935年光华大学创办了《中国语文学研究》，其序中表示，“语文”本是种种学术之本，孔子四科中便有“言语文学”，后来的“汉之训诂，唐之词章，宋之义理，皆统之以语文者也”，但是此后“语文”逐渐流于表面辞藻，不注重原本的实用功能，因此刊物意在重新找准语文实学的定位，做实用的“语文”。^②1937年创办的刊物《语文》，发刊词中很明确地表达了以此命名的用意：“从‘语文’这两个字上，读者会想：这一定是个专门研究语言、文字的刊物。”尽管这是一本专门做研究的刊物，但是编辑希望“‘语文’要做到大家看得懂，要做到对于作家、翻译家、话剧家、国语教师、大学生、高中初中生，乃至一般会说话、会写字的人无不有益”。^③因此，即便是专门用来研究的“语文”，受众也是广大的。1939年王力所著《中国语文概论》序中也表示：“语文本是每人每日所必需，只要把最容易注意到而又不难了解的道理对他们讲，他们也会听得津津有味的。”^④这些关于“语文”研究的文章都尽量往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向努力，或许说明此时即便是作为研究对象的“语文”，也依然有大众化的趋势。

总体来说，这一时段“国语”是官方学科名称，但同时“语文”也基本具备了学科内涵，并在小范围内被当作学科概念来使用。此时的“语文”发展有两个趋势，一是已经初步具备了语文学科的主要特征，二是其大众化属性逐步凸显，这也为此后“语文”成为新中国官方学科名称提供了内在驱动力。

“语文”在近代的产生与演变过程，是其词义逐步确定和丰富的过程，也是其学科性质逐步具备的过程。顾黄初将语文学科的性质总结为工具性、基础性、人文性与技能性^⑤，而“语文”这一词语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步具备了这些性质。

19世纪70年代起，伴随洋务运动开展与学习他国语言文字的需要，“语文”就作为“语言文字”的简化表达在外交政令、政府文件中被使用。20世纪初，“外国语文”作为“补助课”

① 《商务印书馆图书汇报》，总第122期，1931年。

② 光华大学中国语文学会编：《序》，《中国语文学研究》，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1页。

③ 《发刊词》，《语文》第1卷第1期，1937年。

④ 王力著：《中国语文概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页。

⑤ 顾黄初：《语文学科性质之我见》，《语文学习》1997年第1期。

在癸卯学制中出现,延续了“语言文字”的含义,“语文”作为一种交流工具的特征也在“补助课”中得以体现。此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向。直到1920年小学中“国文”的名称被“国语”取代,“语文”又因为“国语”的推行而被赋予了多重含义:教材名称中的“语”是国语、语体文,“文”是文言文、文章;大学“语文系”中的“语”又有“语言”含义,“文”代表“文学”“文法”,“语文”此时已具备人文性。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语文教育”几乎成为专为扫除文盲与推广识字运动而设置的一类教育,即便是“语文”研究者,也注重其编写的读物是否具备可读性、通俗性,这时的“语文”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须学习的技能,已基本具备了一门基础性学科的特征。

综上所述,词语发展的内在动因适应了外部需求,是“语文”能够从词语到学科概念的最主要因素。因为“语文”的发展过程,是逐步具备学科特性和大众化特征的过程,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也是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领导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人民的政党,要作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教育。因此,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末的“语文”概念,恰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社会环境、文化需求等种种外部因素相契合。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8月国家颁布了《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语文”一词便顺理成章地得到官方认可,正式成为语文学科的名称。

(责任编辑:曹 晁)

How Did “Yuwen” Become the Name of Discipline: An Educational History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Word Connotation

Tang Qianqian, Shi Kekan

Abstract: Before “Yuwen” became the name of discipline, it had undergone a long semantic 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The word first appeared in the *Shen Bao* newspaper in the 1870s. During 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driven by the need to learn foreign languages, the term “Yuwen” frequently appeared in the diplomatic documents of the Qing government. In 1904, “Waiguo Yuwen” was formally included as a supplementary course in the Guimao School System. In 1920, in order to promote vernacular writing,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troduced terms related to “Guoyu” such as “Guoyuwen” “Guoyu Wenxue” and “Guoyu Wenfa”, enriching the connotation of “Yuwen”. During the 1930s and 1940s, the “Mass Language Movement” emerged, and “Yuwen” became the language that reflected popular consciousness. To eliminate illiteracy and promote literacy education, “Yuwen Education” appeared in public education halls and the education of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In 1950, “Yuwen” replaced “Guoyu” and “Guowen”, becoming the term for the Chinese disciplin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change was influenced by external polit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factors, but more importantly, it was the result of the semantic development of the term “Yuwen” to adapt to the evolving need of the discipline.

Key words: Yuwen; terminology connotation; name of discipline; popularization